

# 苔痕映照：民族志反思的学术之光

□周大鸣



## 引言：青苔之喻与学术反思的深意

“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”王维留下那抹穿透密林、轻抚青苔的余晖，恰如金光亿主编《复照青苔：反思我的首部民族志》给予中国人类学界的启示——在学科发展的茂密丛林中，那些被时光覆盖的学术初痕，正待被重新照亮。这部由商务印书馆2025年推出的著作，以14位学者对自身首部民族志的自我解剖，构建起方法论深度对话。当民族志这一人类学核心研究方法，在全球化与后现代思潮冲击下面临本体论危机时，《复照青苔》以独特反思视角，揭示了学术探索中的困境与突围路径，以“人的民族志”为核心命题，重申了文化实践主体性的重要。它的价值恰如青苔之于森林，虽不张扬却蕴含生命延续密码，映照出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的深层可能。

## 一、民族志的本质：以人为本的学术实践

民族志(Ethnography)通过深度参与与观察和文化阐释，系统记录、分析与呈现特定群体或文化的整体生活方式。核心在于理解文化内部的逻辑、意义与实践。

### (一)以“人”为本的实践性记录

民族志区别于历史文献或统计报表的根本特征，在于其聚焦文化中行动者的主体性。黄剑波强调，若忽略吴庄基督徒的日常信仰实践，基督教便易沦为政治经济的附庸(页188)。这说明只有深入行动者日常生活，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现象背后的意义网络。马林诺夫斯基的“参与观察”原则至今仍是民族志研究的基石。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田野中，他不仅记录了库拉交换的经济行为，更通过长期参与观察揭示了这一交换体系如何维系社会关系、建构身份认同。这种研究取向在书中得到传承创新，学者们不再满足于静态的文化描述，而是深入行动者生活世界，探寻文化实践内在逻辑。

### (二)方法论的二元统一：参与观察与深描

民族志方法的独特性在于现场感和亲身体验。杨德睿在道观居住学习，展现出研究者需长期融入社区体验文化规则，才可能“深描”(Thick Description)。张亚辉在晋祠水权研究中，通过水利仪式细节揭示宋明儒家伦理与民间巫术的共生关系。这种方法要求学者不仅是旁观者更是参与者，是记录者更是阐释者。

### (三)批判性自反：研究者立场的自我审视

随着人类学后现代转向，民族志研究逐渐承认研究者立场对知识生产的塑造作用。梁永佳自省早期研究将大理白族简化为“汉化/本土”二元框架(页68)，揭示了预设框架可能对文化现象造成扭曲。杨德睿反思“科学抽离”可能遮蔽宗教体验神圣性(页179)。法国哲学家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述在此得到呼应——学术研究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，研究者的位置性决定了知识的生成方式。

## 二、传统民族志的困境与突围路径

《复照青苔》的价值，更在于对传统民族志困境的深刻揭示与突围路径的探索。它系统梳理了民族志研究面临的几大核心困境并提出突围策略。

### (一)静态社区单元与流动网络的张力

传统民族志往往将研究对象视为静态社区单元，忽视文化实践的流动性特征。梁永佳坦言对大理白族的研究困于“社区”单元，将动态朝圣网络压缩为静态结构，忽略了历史纵深的“宇宙地图”(页47-78)。杨渝东在反思苗族迁徙研究时指出，早期田野因执着于村落边界而错失“逃避统治的艺术”(斯科特语)这一区域视野，未能捕捉山地社会与国家的弹性互动(页79-102)。段颖以泰缅边境的流动经验揭示“多点民族志”的陷阱，言唯有跟随行动者轨迹才能理解“无处非中”的地方性(页103-131)。

### (二)理论模型与经验现实的断裂

理论模型的过度应用常导致经验现实的扭曲。舒萍反思湘西茶农研究，发现“国家-地方”二元框架掩盖了市场作为“第三领域”的斡旋作用(页327-346)。刘宏涛在彝族亲属制度研究中意

识到，早期对规则的结构化梳理牺牲了实践中“琐碎的妥协”，而正是这些矛盾维系了社会生命力(页344-373)。黄志辉的劳工民族志直指方法论匹配问题：当劳动周期与田野周期重合，民族志深描方能捕捉“异质性历史”，超越社会学对“底层”的均质化想象(页374-396)。这些反思表明，民族志研究需在理论与经验间保持张力，避免理论模型对经验现实过度简化。

### (三)神圣性与科学性的抵牾

民族志研究中长期存在神圣性与科学性的张力。杨德睿以道士与占卜研究为例，揭示宗教人类学的悖论：民族志的抽离性要求虽能防止“变成土著”，却也阻断了与神圣性的交融体验(页159-182)。黄剑波在基督教研究中提出“身份自觉”伦理——研究者需警惕自身信仰立场遮蔽“地方神学”(页183-226)。李耕则从江湖术士的“关联性思维”中发现，逻各斯中心主义无法统摄占卜实践的宇宙观连贯性(页227-246)。这些反思挑战了科学主义在民族志研究中的霸权地位，呼吁寻求科学性与神圣性的平衡。

### (四)历史感缺失与多元时间性的重构

历史感缺失是多数反思的共性。龚浩群指出，泰国研究若脱离殖民与现代性交织的“多元时间性”，宗教复兴便仅剩政治经济学注解(页247-271)。郑少雄通过康定土司的生命史，试图以“虚虚实实的资料”缝合正史与民间记忆的裂隙，却因未能深入日常世界而留下遗憾(页272-296)。最具突破性的是张亚辉重读晋祠水权；他将水利治理从魏特夫的“专制模型”中解放，置于宋代以降儒家伦理与民间巫术的共生脉络，揭示“静态权力”如何被动态实践瓦解(页397-422)。这些反思表明，民族志研究需重建历史维度，关注文化实践在时间长河中的演变与延续。

## 三、民族志的终极追问与当代回应

《复照青苔》围绕“为谁而写”“如何避免文化霸权”“是否可能‘真实’”三大核心问题展开讨论，不仅是反思集，更是关于民族志终极价值的学术对话。

### (一)为谁而写：学术使命与生命质

陈献章在《复照青苔》中提出“民族志何以今日再议”核心问题，梳理了民族志从19

世纪进化论到当代后现代主义的演变脉络，特别强调“人的民族志”。各章节亮点纷呈：梁永佳坦承第一本民族志“缺乏历史纵深”，杨渝东反思苗族研究中“社区调查”局限，段颖用“流动”概念串联东南亚田野，张文义提出“讲好故事与做好论证”的平衡……这些反思直击人类学方法论要害，展示了学术成长的必经之路——在自我质疑与修正中不断精进。

### (二)学科发展的深层启示

金光亿开篇直指当代民族志研究核心困境：当“田野调查”“深描”等术语被泛化为实证研究标签，民族志本体价值反遭消解。他对照《写文化》的西方视角，强调中国学者需在“本土化”语境中重新锚定民族志的伦理与技艺，从而打破“一次性自我批评”局限，使之成为“撒播在田里的种子”(页1-46)。这一框架既为全书奠定批判基调，也揭示了人类学重建学科认同的迫切性。《复照青苔》不仅促进了对西方理论霸权的反思，更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志方法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。

## 结语：青苔之下的学术微光

《复照青苔》书名隐喻其学术价值。这部带着“痛感”的反思集彰显了一种稀缺的勇气：在工具理性主导的学术生产中，年轻学者以自我批判为火炬，照亮了民族志作为“人文社会科学”的本质——它不仅是知识生产的技艺，更是研究者与世界相互叩问的生命历程。

正如金光亿所言：“民族志的核心要件是再现有‘人’存在的文化实践。”(页43)在学术全球化的今天，中国人类学需要更多反思精神——不惧暴露自身局限，勇于直面方法困境，在批判与自我批判中寻找前行道路。愿《复照青苔》引发的思考，能够如那穿透密林的光晖，持续照亮中国人类学未来的探索之路。

(作者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荣休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首席专家，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。)

# “寓学”与“调性”

“实用”和“审美”一直被认为是毛笔书法的两大功能，然而对何为“实用”何为“审美”的理解却存在巨大误区。毛笔作为传抄工具的实用功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但它“怡情悦性”的一面却在长久发挥作用。同为“怡情悦性”，在当代被称作“审美”，在古代却被认为是“玩物丧志”，分歧关键在于对何为“用”存在不同解读。陈献章《认真子诗集序》云：“夫诗小用之则小，大用之则大。可以动天地，可以感鬼神，可以和上下，可以格鸟类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皇帝霸之褒贬，雪月风花之品题，一而已矣。小技云乎哉？”(《陈献章集》卷一)书法亦如此。在当代人工智能背景之下，书法所具的“寓学”和“调性”的“大用”将会重新焕发，重温岭南先贤陈白沙先生有关论述，可让我们获得新的启示。

作为儒者，陈献章强调“道”比“艺”更重要。对于那些耽于笔札的朋友，他表示担心：“惜其所急者笔札间细事，某且引之于道。”(《陈献章集》卷二《与张廷实主事》)不过，在实际事行中，陈献章认为“道”与“艺”并不对立，而是统一于人“性”。陈献章诗云：“调性古所闻，熙熙兼穆穆。耻独不耻独，茅锋万茎秀。”(《陈献章集》卷四《观作茅笔书》)湛若水《白沙子古诗教解》卷下对此的解释是：

此先生作草书以寓学也。如明道作字时甚敬，即此是学之意。……又言“氤氲若初沐”者，乃古人调性之学，所以有熙熙而光明，穆穆而和敬者。(《陈献章集》附录)

湛若水的疏解可概括出两个关键词，即“寓学”和“调性”，这也是陈献章论书的主要观点。所谓“寓学”，“如明道作字时甚敬，即此是学之意”；关于“调性”，本于邵雍：“平生无苦吟，书翰不求深。行笔因调性，成诗为写心。”(《击壤集》卷十七《无苦吟》)其核心思想是要求自然的书写，这与“以书为乐”的思想异曲同工。陈献章也主张“以书为乐”：“东园集茅本，西岭烧松烟。疾书澄心胸，散满天地间。聊以悦俄顷，焉知身后年。”(《陈献章集》卷一《书法》)

所谓“动上求静”即摄情归性。《白沙子古诗教解》卷上《赠陈秉常》：“性者，心之生理，何尝不正？有不正者，情也。邪思

之，情之流也；故思无邪，所以节情之流而正其性也。”陈献章对于“情”采取较宽容态度，但并未超越其时代，他对于情的论述不可能走得更远，这与明代中后期风起云涌的“主情”美学思潮还不能同日而语。陈的意义在于，于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时代，通过借古开今方式，为“情”的抬头放出一线光明，也为明代书法思想从理学桎梏下解放出来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。

陈献章并未对书法的审美特征有更多阐述，他更感兴趣的是书法所负载的社会道德功能。他将书法的各种风格变化与人的性情联系，最后归结为如何“正心”的问题。

他要求学者向内用功，通过“安静以待终”(《陈献章集》卷四《病中写怀寄李九渊》)的修养方式，归全功于自我，得源泉之涓涓，在虚静境界中把握万物存在，解其天授而恢复本性。陈献章认为，性乃天生，是自然之性，只不过因人欲遮蔽才导致“坏其性”结果。

因此，摒除习气是实现“以正吾心”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要求，他用一句诗概括：“习气移性情，正坐闻道晚。”(《陈献章集》卷四《示李孔修近诗》)陈献章之所以强调“静坐”致功，根源在于对两种“为学”方式的区分：“夫学有由积累而至者，有不由积累而至者；有可以言传者，有不可以言传者。”(《陈献章集》卷二《复张东白内翰》)

就书法修为而言，这些论述同样适用。自宋代以来，书法讲究“书卷气”，这成为文人共识，读书万卷更是书家自觉追求。陈献章主张静坐，反对读书穷理。他认为应该“以我观书”，反对“以书博我”。《陈献章集》卷一《道学传序》：“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，察于动静有无之机，致养其在我者，而勿以闻见乱之。去耳目支离之用，全虚圆不测之神，一开卷尽得之矣。非得之书也，得自我者也。盖以我而观书，随处得益；以书博我，则释卷而茫然。”他认为读书须与明心结合，二者有渐次之分。主张先本乎明心，而后“体认物理，稽诸圣训”，这样才能做到“各有头绪来历，如水之有源委也”(《陈献章集》卷二《复赵提学金宪》)。究其宗旨，乃在于“夫学贵乎自得也，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”(明·徐达)

之，自然之文言，生于自然之心胸；自然之心胸，生于自然之学术；自然之学术，在于勿忘勿助之间。如日月之照，如云之行，如水之流，如天葩之发；红者自红，白者自白，形者自形，色者自色；孰安排是？孰作为是？是谓自然。”(《陈献章集》附录)“自然”无疑可看作是陈献章对书法境界的最终要求，而陈献章的书法创作也因实践了这一原则得到后人充分肯定。

## ——白沙书教的当代意义

□陈志平

名臣琬琰续录》卷二十二《翰林检讨白沙陈先生行状》。即主张顿悟后渐修，而且是积累之功在后。这种看法在台阁体横行的“优孟”时代确实振聋发聩。

### 三

陈献章采取“静坐”的为学方式，目的是要恢复人被遮蔽已久的自然之性，但此自然之性不是动物性，而是被提升的人性，充满儒家道德内涵，占位标准是儒者“性情”和“气象”。陈献章《与罗一峰》：“学者先须理会气象，气象好时，百事自当。”(《陈献章集》卷二)儒者的“气象”和“性情”需要符合的要求是“变急为缓，激烈为和平”，这也成了陈献章对文艺的要求：“欲学古人诗，先理会古人文性情是如何。有此性情，方有此声口。只看程明道、邵康节诗，真天生温厚和乐，一种好性情也。”(《陈献章集》卷一《批答张廷实诗笺》)。

陈献章虽没有以此来明确要求书法，但从对书法“放而不放，留而不留”“得志弗惊，厄而不忧”“法而不固，肆而不流，拙而愈巧，刚而能柔”的描述中可窥见其所倡导的中正平和审美祈尚。

陈献章没有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论述书法，他对书法的一些理解需从其哲学思想中寻绎，其学生湛若水的传释是重要媒介。湛若水《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》在阐释其师“自然”这一概念内涵时说：“盖其自然之文言，生于自然之心胸；自然之心胸，生于自然之学术；自然之学术，在于勿忘勿助之间。如日月之照，如云之行，如水之流，如天葩之发；红者自红，白者自白，形者自形，色者自色；孰安排是？孰作为是？是谓自然。”(《陈献章集》附录)“自然”无疑可看作是陈献章对书法境界的最终要求，而陈献章的书法创作也因实践了这一原则得到后人充分肯定。

### 四

陈献章主张“自然”的书写，将书法作为“调性”“陶情”“正心”的手段，这是对人性的回归和对书法“大用”的肯定。他特别重视“生机”“源泉”“真乐”，这一

切都归于“自得”。在“自得”前提下，主张“以我观书”“致养在我”“因书入道”，强调书法“寓学”和“调性”的特质，从而将书法导向与人的“心性”与“天道”相结合的道路。

回头看当前书法创作，最大问题是“无我”，具体表现为“三无”，“无真心”“无真情”“无真性”，流行的“展览体”本质上是一种浅层次书写，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是迟早的事。其次是“有欲”，即学习书法的功利性太强，学术者心中横亘着“把字写好”的欲望，降低了因书入道的可能性。

人工智能的勃兴首先会冲击“低度”的美术，同时也会淘汰“浅层”的文学。从积极一面看，在一定程度上能阻挡书法美化步伐；但从消极一面看，会加剧书法与文学的割裂。然不管怎样，书法“调性”功能会愈发彰显，而原本“把字写好”的目的论，必将转变为“好好写字”的“寓学”过程。

书法在中国文化中享有极高地位，其地位之所以高，决不在能够“发挥文者”，也不在是“无形之相”，而是能直指人心，体现人性深度和人之为人的生命温度，以此区别于二进制“算法”。中国文化的目標是天人合一，但在人工智能时代，需要人机分离，因“机器”并不具备“天道”属性。与人性深度结合的毛笔书写，在这一关系人类未来命运的“大决战”中，定会发挥更加有效和积极的作用。

(作者是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华南师范大学书法研究院院长)



陈志平书法作品

